

SDGs 理念運用於流行音樂教育中的融入 與實踐成效之研究

林予安¹、*徐志杰²

¹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工作學系、²南臺科技大學流行音樂產業系

*cchsu@stust.edu.tw

摘要

本研究將流行音樂視為促進社會變革的工具，旨在探討將音樂教育融入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與《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的課程設計，並評估其對減少對身心障礙者偏見與提升共融意識的影響。研究通過比較傳統的生命教育模式與創新的共融協作課程，為高等教育中融合永續發展、身心障礙者權利、共融社會與音樂教育提供了多元發展的可能性。研究採用「The Attitude Toward Disabled Persons (ATDP) 量表」作為測量工具，評估學生對身心障礙者態度的轉變。研究對象為 82 名學生，其中 68 名參與了生命教育課程，10 名參與了共融協作工作坊並填寫量表。結果顯示，參與共融協作活動的學生在 ATDP 量表上的分數有顯著提升，且其成效優於傳統的生命教育課程。此外，雖然性別與生活經驗等變項，對於 ATDP 分數之影響未達統計上顯著差異，但女性參與者對相關議題的關注度較高，這可能反映了其社會角色的影響，值得更進一步的研究與探討。

關鍵詞：音樂教育、社會變革、共融、身心障礙者權利、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

Exploring the Integr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SDGs in Popular Music Education

Yu-An Lin¹, *Chih-Chieh Hsu²

¹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² Department of Popular Music Industry, Southern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role of popular music as a catalyst for social change by integrating music education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and 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CRPD). It evaluate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is integration in reducing bias against 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and promoting inclusion. By comparing traditional life education with collaborative inclusion courses, the research highlights new possibilities for merg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disability rights, and music educ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Utilizing the "Attitude Toward Disabled Persons (ATDP)" scale as a measurement tool, the study assesses changes in students' attitudes toward 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The sample comprised 82 students, with 68 participating in life education courses and 10 engaging in collaborative workshops, all of whom completed the ATDP scale. The results indicated a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scores among students involved in collaborative activities, demonstrating superior outcomes compared to those in traditional life education courses. While factors such as gender and life experience did not yiel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female participants demonstrated greater interest, suggesting social role influences that warrant further exploration.

Keywords: Music education, Social change, Inclusion, Disability righ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Received: Sep. 16, 2024; first revised: Dec. 11, 2024; accepted: Dec. 2024.

Corresponding author: C.-C. Hsu, Department of Popular Music Industry, Southern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inan 710301, Taiwan.

壹、緒論-研究背景與動機

一、高等教育的多重使命

教育一直是知識的搖籃與人才的培養地，高等教育不僅是培育學術與專業知識的場所，更承擔著培養具有全球永續發展觀念的下一代人才之重任。隨著全球化、技術進步與人類文明的發展，高等教育的角色和重要性在當代社會中愈加顯著。高等教育不僅提供專業知識和技能，還致力於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考、團隊合作與領導才能，以準備他們面對未來的職場挑戰。然而，高等教育的使命並不限於此，還與社會的核心價值與目標緊密相關。因此，當論及培育具永續發展觀念的下一代，高等教育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

二、全球永續目標與障礙者權利的連結

消除對性別、種族與身心障礙者的不平等、偏見與歧視是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第十項“減少不平等”與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CRPD）所共同強調的重要目標。SDGs 旨在解決全球最迫切的問題，如貧困、饑餓、健康及消除各類型的不平等，各國政府需要攜手應對這些阻礙全球永續發展的挑戰。CRPD 則強調每個人，不論其身體狀況、背景或社會地位，都應有平等參與社會的權利。隨著時代的進步，社會大眾對於不同性別與族群的共融有了更深入的認識與理解，然而，身心障礙者的權益改善卻未見顯著進展。這一現象凸顯出教育在專業知識培育之外，更應成為推動社會公平、包容與永續的重要力量。因此，消除對身心障礙者的偏見與歧視，不僅有助於促進社會的多元與共融，還是實現全球永續發展目標的關鍵因素。

三、流行音樂的影響與教育契機

如何將 SDGs 與 CRPD 融入高等教育的課程設計中對於培育下世代人才至關重要。特別是流行音樂在社會變遷中扮演著不容忽視的角色。對許多人而言，音樂可能僅是娛樂和休閒的一部分，但它也是反映社會的一面鏡子，以及促進社會變革的重要力量。歷史上，許多音樂家透過他們的歌曲提出對於社會議題的觀察與批判，激發人們對於這些議題的重視，最終產生社會變遷。更進一步來說，流行音樂不僅影響與建構我們的文化與價值觀，也在過程中藉由音樂敘事，促進了不同群體的理解，減少彼此的偏見。因此，在流行音樂人才培育中融合 CRPD 與 SDGs 目標對於促進社會變遷具有關鍵作用。

四、研究方向與目標

本研究旨在探討融合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與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理念的流行音樂創新課程，如何有效減少對身心障礙者的偏見並促進共融。課程設計以流行音樂為社會變革工具，結合大學社會責任計劃之目標，對比傳統生命教育模式，探索創新教學的可能性。課程納入流行音樂創作與演出的實務操作，讓學生與身心障礙者合作，促進多元群體間的理解與互動。初步結果顯示，參與課程的學生對身心障礙者的態度明顯改善，並展現更積極的社會參與意識。國際研究亦證實，將 SDGs 與教育相結合的創新設計能有效推動社會公平與多元共融，為本研究提供了堅實的理論與實證支持。本研究希望深化流行音樂與共融教育之間的協作，為高等教育實現永續發展目標提供具體範例，並促進高等教育應對當前與未來挑戰的能力。

貳、文獻分析

一、社會共融與多元性在全球永續發展中的角色

在 21 世紀，全球永續發展已成為各國共同的使命和挑戰。聯合國在 2015 年推出的永續發展目標（SDGs）和 2006 年通過的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提供了具體的方向和策略，凸顯了社會共融和

多元性在全球永續發展中的關鍵作用。另一方面，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不僅是社會共融和多元性的象徵，更是國際社會首次將身心障礙者的權益納入全球人權議程的重要里程碑。CRPD 不僅強調身心障礙者的基本人權，還專注於確保障礙者能在各個社會領域中享有平等的參與機會。這兩項重要的全球政策揭示了一個點出了永續社會的關鍵議題：只有當所有人都被納入、參與並得到尊重時，我們才能實現真正的永續發展。

談及社會共融不能只侷限是為邊緣群提供社會參與機會的救濟，也是群體能否實現社會、經濟和環境永續發展的關鍵。例如，當身心障礙者接受適當的教育和培訓，並能進入勞動市場時，不僅可以提高他們的生活品質，還為整個社會帶來經濟效益。此外，當我們建立無障礙的公共場所和設施時，這不僅有助於身心障礙者，也讓所有對無障礙設施有需求的參與者受益，包含長者、嬰兒車使用者與傷者。綜合以上，社會共融和多元性不僅是實現對於人權的保障，更是實現全球永續發展的必要條件。

二、臺灣共融與障礙教育現況

自 2006 年臺灣通過《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政府積極採取各類型政策與環境改善行動，以保障障礙者具有平等參與社會之機會，其中「共融教育」成為學習場域中轉變障礙者刻板印象的重要課程。從相關研究文獻中可以將現有臺灣「障礙共融教育」區分為三個角度，其為個人／醫療模式、生命教育模式與障礙體驗模式。

首先，個人／醫療模式將身心障礙視為疾病與損傷，是個人層次，並由醫療專業主導的議題，例如在校園中以輔導資源，協助身心障礙學生在學習能力、生活適應、特殊活動、社交生活等方面的困難，強調改變個人來適應社會，並透過如加分、經濟補助等方式，以優惠待遇與物質資源的重新分配達到「結果平等」，但在個人／醫療模式下，障礙者常因不被視為正常的社會成員，導致權利被忽略。第二、生命教育模式，以邀請名人身心障礙者或以障礙者成功故事為啟發，引導學子「珍惜生命、尊重生命、熱愛生命」之態度。而此模式之角度大多以非身心障礙者之觀點描述障礙者克服自身損失達到特定目標之成功經驗，較少談及身心障礙者在社會中所面對之系統性障礙，包含歧視、缺少平等社會參與，以及障礙者的多元經驗等。第三、障礙體驗。體驗活動是一種創造現實元素的表徵來進行學習的活動，讓參與者發展技能、獲得知識或改變他們對現實的態度。常見的活動包含使用輪椅、盲人行走、使用耳塞降低聽力以及由他人餵食等，讓參與者感受感官與肢體功能受到限制的情況。研究顯示體驗障礙對於增進同理心、增強自我意識和對多元的接納能有一定程度之提升，然而這方式向人們展示身心障礙者消極和困難的經歷，強調身心障礙的個人／醫療模式，偏重身心障礙者努力生活的神話以及對他們的同情，而不是消除刻板印象。例如，矇眼體驗視障者生活僅能表現人失去視覺當下的創傷感受，而無法重現視障者身為一個群體於社會中的真實經驗。從上述分析中可以發現，現有「障礙共融教育」大多以醫療模式為設計核心，將焦點聚焦於如何克服因「缺損」所造成之障礙（個人經驗），或是藉由演講與模擬體驗障礙者的身體困境，卻少採用 SDGs 與 CRPD 所強調的共融與平等參與的社會模式來引導大眾學習與理解身心障礙者所面對的系統性偏見，及其所面對的社會歧視與環境障礙。

因此，高等教育如何在實踐中體現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和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的理念，強調提供平等參與機會，讓障礙者與非障礙者能以彼此的興趣或專業為基礎，進行「共融」與「協作」的教育模式，透過專業合作共同執行工作，並以此推動群體間的相互理解和尊重，是高等教育培育下世代人才的關鍵。

三、融合 SDGs 進入課程設計的機會與挑戰

在當前的全球化背景下，將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和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的理念融入高等教育體制變得越來越重要。高等教育機構通過融合這些概念，不僅能夠提升教學品質，也能培養學生的全球公民意識和社會責任感。但這一轉變不僅是對學術傳統的挑戰，也是對教育資源調配與包容性的重新審視。

目前許多國家的教育機構已開始將相關概念融合至教學中，並且獲得顯著成效。例如，義大利在 2020

年，進行了一系列的系統性地調查，成果顯示將 SDGs 融入課程設計，不僅能有效提升學生對社會責任的認識，還展現此種教學策略在國家層面上的可行性。更進一步來說，墨西哥高等教育機構（the Intercultural University of Veracruz）透過為原住民群體提供平等教育機會，拓展了群體多元對話的可能，也展示了有效實現 SDGs 地具體方法。在亞洲，日本的立命館大學也針對大學生對於在課程設計中融入 SDGs 後的成效進行調查，正向的學習成果也支持將 SDGs 融入課程對提升學生永續發展觀念的重要性。這些案例證明了融入 SDGs 和 CRPD 不僅可行，而且對於推動高等教育的創新和社會責任具有重要意義。

儘管如此，許多國家在執行相關課程創新時也面臨許多挑戰。首先，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如何在融合 SDGs 與 CRPD 概念的同時、同樣可以達到課程的學習目標與成果。例如，印尼許多大學融合 SDGs 於課程中所展現的積極策略包括開發相關的學分學程與成立 SDGs 中心等。然而這些資源投入是否排擠到其他教學需求，這個問題也揭示了大學教育在實行相關融合時所面臨的資源與時間上的限制。此外，學術文化和組織結構也可能成為實施的阻礙。像是創新課程設計是否能同時符合 SDGs 的目標與學術行政規範都是在執行上需要克服的課題。因此，高等教育機構在融合這些概念時，需要靈活應對的創新課程設計，才能在執行中沒有偏離原本課程的教學目標與成果。

四、流行音樂與社會變遷

音樂在促進社會共融和多元性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因為它可以跨越文化和社會隔閡，成為各種群體之間溝通和共融的橋樑。更進一步來說，音樂不僅是一種娛樂方式，更是一種強有力的社會和政治表達形式。音樂有能力喚起情感，促進對社會問題的認識，並激發行動。例如，許多臺灣與國外的社會與反戰運動中，音樂成為了表達抗議和追求變革的重要媒介。因此，流行音樂提供不只是娛樂，更可以是促進社會變遷的有效工具。

音樂教育同樣對於促進社會共融和多元性具有深遠影響。研究指出音樂教育不僅提供了技能和知識的學習，更是培養學生對不同文化敏感度和欣賞能力的重要途徑，促進對於多元文化背景的理解。此外，音樂教育也被視為培養學生創造力、批判性思維和團隊合作能力的有效工具，這些都是當今社會所需要的重要技能。在當代社會，將永續觀念融入音樂培訓中越來越受到重視。音樂教育也可以是培養學生對永續發展的認識和參與的重要平臺。透過音樂創作和表演，學生可以探索和表達和永續發展相關的議題，從而提高對環境和社會正義問題的認識。

總結來說，音樂教育在促進社會共融、多元性及永續發展意識中扮演著關鍵角色。藉由養成對不同文化的敏感度和欣賞習慣，同時鼓勵創造性和批判性思維，音樂教育不僅豐富了學生的技能和知識，也有助於塑造更和諧共融的社會。

五、綜合評論：流行音樂課程對共融與障礙教育的關聯性

社會共融與多元性對於全球永續發展的重要性不容忽視。聯合國的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及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均突顯了這一點。社會共融不僅為邊緣群體提供參與機會，更是一種全面性的發展策略，強調多元性與共融是達成社會、經濟和環境永續的關鍵。

臺灣近年在推行共融教育方面具有大幅進展，但仍存在侷限性。目前的教育模式大多聚焦於個人層面，如個人／醫療模式和生命教育模式。這些模式往往無法全面解決社會上對障礙者的刻板印象和歧視問題，忽略了對社會結構性問題的深入理解和改革。全球各地高等教育機構在融入 SDGs 過程中展現出顯著成效。這些機構透過創新的教育方法和工具，不僅在提高學生對永續發展議題的認知上取得進展，也在實際行動上發揮重要作用。這些成功案例對臺灣推動類似教育改革提供了參考。特別是在教育領域，將永續與平權觀念融入專業訓練中被證實能有效提升學生的社會共融和多元性意識。這為臺灣發展融合 CRPD 與 SDGs 概念的音樂培訓課程提供了寶貴的指引。

綜合上述分析，高等教育需要更多融合 CRPD 與 SDGs 概念的創新課程，特別對流行音樂課程，這正是臺灣培育流行文化產業人才的核心議題，也是推動社會變遷的重要力量。

參、研究方法與研究設計

一、研究目的與問題

本研究旨在探討在高等教育體系中將流行音樂教育結合 SDGs 與 CRPD 目標之障礙共融教育的創新實施方式，特別是去比較傳統生命教育演講與「共融協作」模式對障礙平權態度的影響。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評估這兩種教育方法在提升學生對身心障礙者的理解和消除偏見方面的有效性。為了達成這一目的，本研究將著重於回應以下三個關鍵問題：

(一) 傳統生命教育演講對之於學生對在改變其對身心障礙者的態度與偏見影響為何？

這個問題將探討傳統的演講式生命教育在提高學生對身心障礙者的認識和同理心方面的效果，以及這種方法的局限性。

(二) 融合SDGs與CRPD目標之「專業協作」音樂培訓模式是否能有效提升學生對身心障礙者的共融意識和態度？

(三) 比較傳統生命教育演講與「共融協作」模式，哪種方法在提升學生對身心障礙者平權態度上更顯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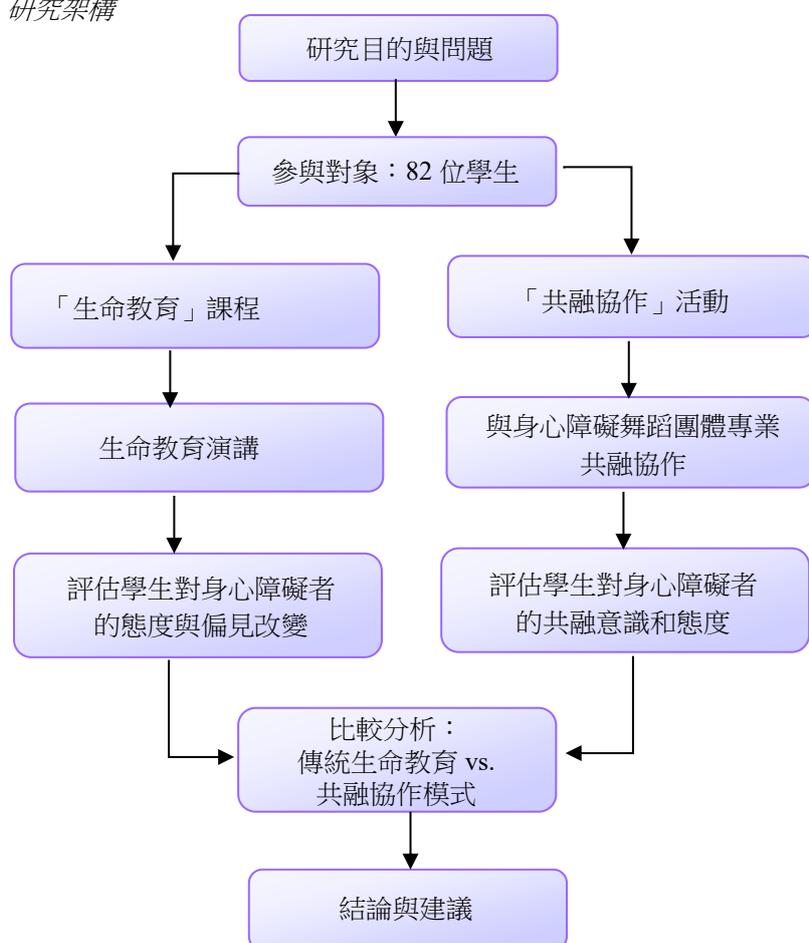
透過這些問題的探討，本研究期望能為流行音樂的創新教學提供有力的證據，並為未來相關教育實踐和政策制定提供指引。

二、研究架構與程序

(一) 研究架構

圖 1

研究架構



本研究聚焦於探索創新的教育介入方法對提升／減低對於身心障礙的概念／偏見之影響。研究參與者包含82位學生，其中68位於生命教育課程後填寫問卷，10位學生自主參與共融協作共作坊。這項研究通過兩種教育介入層次，旨在評估這些方法如何改善學生對身心障礙者的態度。在本研究的設計中，傳統生命教育模式以演講形式為主，由身心障礙者創作者分享個人經歷，學生以觀眾角色進行學習，重點放在感性層面的啟發與同理心的提升，以單向經驗分享為主。相較之下，「共融協作」活動透由該校流行音樂產業系與身心障礙舞蹈團體合作，讓學生運用課堂所學之展演與活動規劃之專業知識，與身心障礙舞蹈團體一同規劃，推動身心障礙者與非障礙者共同參與的藝術表演活動。專業「共融協作」的目的是通過實際的合作和創作過程，加深學生與身心障礙者之間的相互瞭解和共融。

(二) 研究程序

研究的兩層次介入，包括生命教育演講和專業協作活動。參與者在生命教育演講前一週完成前測問卷，並在演講後進行後測。在「共融協作」活動中，學生運用流行音樂專業知識（如編曲、表演和活動規劃），與身心障礙舞蹈團體共同設計並執行藝術展演。活動的核心在於透過音樂創作過程中的合作與交流，幫助學生深入了解身心障礙者的經驗與需求，並透過音樂語言傳遞共融理念。例如，學生需根據障礙舞蹈團的需求調整音樂風格或表演方式，並舉辦能符合障礙者與非障礙者參與者需求之排練與會議，最終攜手完成一場共融展演。這些活動不僅讓學生在實踐中體驗共融理念，也促進了對偏見的反思與態度改變，從而為臺灣障礙共融教育的發展提供新的見解和建議，下表為施測規劃表：

表 1

研究程序規劃表

序號	階段名稱	活動內容	施測時間點	參與者
1	前測	完成前測問卷	生命教育演講一週前	全體參與者
2	第一階段介入	身心障礙者生命教育演講	演講後	全體參與者
3	第二階段介入	藝術共融表演規劃	活動規劃執行後	自願參與者

三、研究施測工具-The Attitude Toward Disabled Persons (ATDP) 量表應用

本研究採用經典的 The Attitude Toward Disabled Persons (ATDP) 量表作為主要測量工具。此量表經過研究團隊翻譯，並得到美國身心障礙領域專家學者與台灣大學研究倫理審查通過，以確保譯本的準確性和適用性。ATDP 量表的特點在於它測量的是對身心障礙者的整體態度，而不限定於特定類型的障礙。

(一) 量表結構

ATDP 量表包含多個陳述句，涵蓋工作、人際關係到情感或個性等生活的各個面向，旨在全面評估受訪者對身心障礙者的態度。量表共有三種形式，本研究選擇使用表 B 版本，其包含 30 個項目。

(二) 評分方法

每個項目均需受訪者回答「同意」或「不同意」。例如，一個積極的陳述可能是「身心障礙工作者能與其他工作者一樣成功」。而消極的陳述如「最好讓一位身心障礙者與另一位身心障礙者結婚」。量表採用 5 點量表，從+2「非常同意」到-2「非常不同意」。其中，11 個項目設計為反向問題。總分範圍為-60 至 60，並通過增加常數 60 調整使所有分數為正值，範圍從 0 至 120。

ATDP 量表在國際中被廣泛應用，其信度與效度得到多方驗證。Yuker 與 Block (1986) 指出，ATDP 的折半信度係數範圍從 0.75 到 0.85，表明量表項目之間具有高度的一致性。Tervo 等人 (2002) 的研究進一步驗證了 ATDP 在醫療領域評估對身心障礙者態度的適用性，顯示其內在信度的 Cronbach α 達到 0.855，具有良好的內在一致性。這些結果支持本研究選擇 ATDP 作為核心測量工具的科學性。

(三) 倫理考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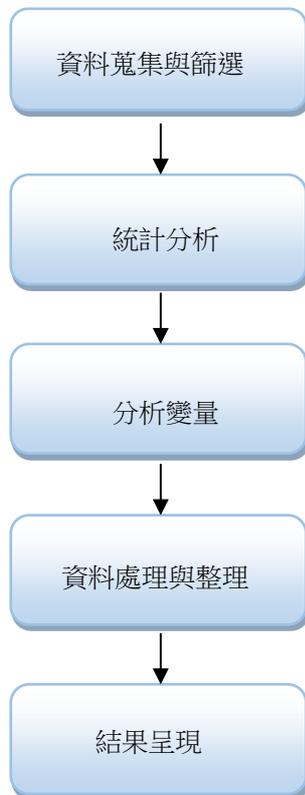
為確保研究的倫理性，本研究通過臺灣大學倫理研究中心 REC 的審查。所有研究方法、量表和招募方式均符合研究倫理規範。

四、資料整理與分析流程

本研究的資料分析與處理流程包含以下關鍵階段，旨在確保結果的有效性與可靠性：

圖 2

資料整理與分析流程



(一) 資料蒐集與篩選

研究團隊在南臺科技大學進行資料蒐集工作。在前測階段，共有 82 位參與者，其中 68 位填寫了 ATDP 量表，第二階段參與者 62 位完成了生命教育演講後的跟進測量，10 位學生則參與了專業協作活動的後期評估。

(二) 統計分析

本研究選擇使用 SPSS 統計軟體進行數據處理與分析。這包括了描述性統計分析，用以確定參與者的人口學特徵，以及 t 檢定，以評估不同教育介入模式對改變態度的影響。研究特別關注參與者的 ATDP 量表得分在前測、第一次後測及第二次後測的變化情況。

(三) 分析變項

研究重點聚焦於包括性別、年齡以及與身心障礙者的關係（是否為朋友或家庭成員）等關鍵變項。在進行 t 檢驗之前，對這些變量進行了詳細的描述性統計分析，確保樣本的代表性和多樣性。

(四) 資料處理與整理

在進行統計分析之前，所有資料均經過嚴謹的輸入和清理工作，以確保數據的完整性、準確性，並排除任何無效或移漏的回應。

(五) 結果的呈現

本研究的結果將通過表格和圖表形式直觀展現，清晰呈現各階段量化分析的結果。

通過以上綜合的資料分析與處理方法，本研究力求深入理解不同教育介入策略對提升學生對身心障礙者態度的影響，旨在為障礙共融教育領域提供實證支持和新的洞見。

肆、研究結果

一、參與者基本統計資料（前測）

在本次研究中，共有 82 位參與者出席，其中 68 位填寫了前測階段的 ADTP 量表，其中參與者的平均年齡為 18.5 歲（標準差為 2.6）。62 位參與者在參加了生命教育演講（即第一次介入活動）後，完成問卷填寫。第二次介入活動（共融協作），則有 10 位參與者自願投入與障礙藝術家一同規劃共融展演活動之工作坊三次，並於活動後進行了第二次後測。

在性別分析中，前測樣本中有 23 位（約 33.8%）為男性，37 位（約 54.4%）為女性，8 位（約 11.8%）選擇不回答其性別。而在完成第一次後測的 62 位參與者中，沒有任何人勾選「選擇不回答性別」的選項。在第一次後測階段包括 62 位參與者，其中 64.2% 為女性，35.8% 為男性；在第二次後測階段有 10 位參與者，其中 80% 為女性，20% 為男性。

在家庭成員與朋友是否有身心障礙者之變項上，前測時 68 位填答者中，有 11 位（16.2%）表示家庭成員中有身心障礙者，16 位（23.5%）參與者有身心障礙的友人。在第一次介入後，62 位參與者，有 9 位（14.5%）表明他們有家庭成員是身心障礙者，並有 12 位參與者（19.4%）表示他們有身心障礙的朋友。而在第二次介入後，則有 5 位（50.0%）參與者表明有身障者家人，4 位（40.0%）表明有障礙者朋友。這些資料反映了參與者在家庭和社會關係方面與身心障礙者的接觸情況，這可能對他們對於身心障礙議題的態度和認知。

表 2

參與者基本統計資料

	前測	第一次介入後 (生命教育講座)	第二次介入後 (共融協作工作坊)
男生	23 (33.8%)	22 (37.1%)	2 (20.0%)
女生	37 (54.4%)	40 (62.9%)	8 (80.0%)
選擇不回答性別人數	8 (11.8%)	0 (0.0%)	0 (0.0%)
參與者總數	68	62	10
家庭成員中 有身心障礙者	Yes: 11 (16.2%) No: 57 (83.8%)	Yes: 9 (14.5%) No: 53 (85.5%)	Yes: 5 (50.0%) No: 5 (50.0%)
有身心障礙者朋友	Yes: 16 (23.5%) No: 52 (76.5%)	Yes: 12 (19.3%) No: 50 (80.7%)	Yes: 4 (40.0%) No: 6 (60.0%)

二、ADTP 分數分析

為了提升參與者的意願，本研究團隊採用匿名方式收集數據，並透過獨立樣本 t 檢驗進行統計分析，旨在理解參與者對身心障礙者態度分數在介入活動前後的統計學上差異。在整體 ADTP 分數分析中（見表 3），前測時平均 ADTP 分數為 64.3（標準差=10.7），在第一次後測時為 66.35（標準差=8.8），第二次後測時為 75.9（標準差=12.4）。初步結果顯示，生命教育演講和專業協作活動都能有效促進參與者對身心障礙者的正面態度，而參加專業協作活動的參與者在態度分數上的提升（統計顯著）高於僅參加生命教育演講的參與者。

為了進一步檢驗介入活動對參與者 ADTP 分數的影響，本研究採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ANOVA）。結果顯示，介入活動對分數有顯著影響（ $F(2, 137) = 5.96, p = .003$ ），表明前測、第一次後測（生命教育課程）與第二次後測（共融協作活動）在 ADTP 分數上存在統計學上的顯著差異。Bartlett 均等檢驗結果不顯著（ $\chi^2(2) = 3.45, p = .178$ ），表明滿足變異數同質性假設。進一步的 Bonferroni 校正事後比較顯示，共融協作活動的 ADTP 分數（ $M = 76, SD = 12$ ）顯著高於前測（ $M = 64, SD = 11, p = .002$ ）和生命

教育課程後測 ($M = 66, SD = 9, p = .017$)。然而，前測與生命教育課程之間的 ADTP 分數無顯著差異 ($p = .708$)。這些結果表明，雖然生命教育課程對態度有提升作用，但最顯著的態度改變發生於參與共融協作活動之後。

進一步的性別 ADTP 分數分析顯示，在前測時，女性參與者 (平均值=66.5, 標準差=9.0) 的 ADTP 分數高於男性參與者 (平均值=61.3, 標準差=11.4) 及選擇不回答性別者 (平均值=62.4, 標準差=14.4)，但未達統計上顯著差異； $F(1, 60) = 2.22, p = .1414$ 。在第一次後測中，女性參與者 (平均值=67.6, 標準差=8.8) 的 ADTP 分數仍高於男性參與者 (平均值=64.2, 標準差=8.4)，但差異仍未達顯著； $t(60) = -14.902, p = .1414$ 。由於樣本數過小，第二次後測未進行性別分析。

在有無身心障礙家人和朋友的分數分析方面，前測結果顯示，有家庭成員是身心障礙者的參與者 (平均值=60.3, 標準差=11.0) 的 ADTP 分數略低於無身心障礙家庭成員的參與者 (平均值=65.0, 標準差=10.5)，但兩者在統計上無顯著差異； $t(66) = 1.3635, p = 0.1774$ 。同樣地，有身心障礙朋友的參與者 (平均值=65.9, 標準差=12.6) 的 ADTP 分數高於無身心障礙朋友的參與者 (平均值=63.8, 標準差=10.0)，但差異不顯著； $t(66) = -0.7142, p = 0.4776$ 。

第一次後測結果顯示，有家庭成員是身心障礙者的參與者 (平均值=69.3, 標準差=12.6) 的 ADTP 分數略高於無身心障礙家庭成員的參與者 (平均值=65.8, 標準差=8.0)，但未達統計顯著水準； $t(60) = -1.1053, p = 0.2734$ 。同樣地，有身心障礙朋友的參與者 (平均值=65.1, 標準差=5.5) 的 ADTP 分數略低於無身心障礙朋友的參與者 (平均值=66.7, 標準差=9.4)，差異同樣不顯著； $t(60) = 0.5568, p = 0.5797$ 。

最終結果表明，專業協作活動在促進參與者對身心障礙者的正面態度上具有潛在效用，同時也指出了後續研究方向，尤其是在性別、家人或朋友是身心障礙者的背景對 ADTP 分數的影響，這部分將在後續章節進一步探討。

表 3

ADTP 分數分析表

階段	平均 ADTP 分數 (標準差)	性別差異	與身心障礙家庭成員的 關聯	與身心障礙朋友的 關聯
前測測試	64.3 (10.7)	1.女性：66.5 (9.0) 2.男性：61.3 (11.4) 3.不願回答：62.4 (14.4) $F(1, 60) = 2.22, p = .1414$	1.有家庭成員：60.3 (11.0) 2.無家庭成員：65.0(10.5) 3. $t(66) = 1.3635, p = 0.1774$ 差異不顯著	1.有朋友：65.9 (12.6) 2.無朋友：63.8(10.0) 3. $t(66) = -.7142, p = 0.4776$ ，差異不顯著
第一次 介入後	66.35 (8.8)未顯著 高於前測 $t(128) = -1.2136, p = .2271$	1.女性：67.6 (8.8) 2.男性：64.2 (8.4) 3. $t(60) = -14.902, p = .1414$ ，差異不顯著	1.有家庭成員：69.3 (12.6) 2.無家庭成員：65.8 (8.0) 3. $t(60) = -1.1053, p = 0.2734$ ，差異不顯著	1.有朋友：65.1 (5.5) 2.無朋友：66.7 (9.4) 3. $t(60) = .5568, p = 0.5797$ ，差異不顯著
第二次 介入後	75.9 (12.4)顯著高 於前測 $t(76) = -3.1538, p < .01$ ；同 時也顯著高於第一 次介入後 $t(70) = -3.0091, p < .01$	N/A	N/A	N/A

三、研究結果分析結論

本研究旨在評估生命教育與共融協作課程對提升學生對身心障礙者態度的影響。綜合分析結果，我們得出以下幾點重要發現：

(一) 生命教育對共融態度的影響

研究數據顯示，生命教育在提升學生對身心障礙者的共融態度上，分數有所提升，但其效果在統計學上並不顯著。在前測時平均 ADTP 分數為 64.3，第一次後測時為 66.35，但這些變化在統計上並不顯著，這表明單獨的生命教育課程對改變學生對身心障礙者態度的影響有限。

（二）共融協作活動的顯著效果

相比於生命教育，參與共融協作活動的學生在 ADTP 分數上的提升在統計學上顯著，且分數提升幅度明顯。第二次後測的平均分數（75.9）顯著高於第一次後測（66.35），這顯示了共融協作活動在促進學生對身心障礙者的正面態度上具有顯著的效果。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的結果進一步支持這一結論，共融協作活動的效果顯著高於生命教育課程（ $p = .017$ ）和前測（ $p = .002$ ）。這表明，共融協作活動在促進學生對身心障礙者態度的轉變中具有更為顯著的影響力，進一步證實了此類創新教育方式的潛力。

（三）性別對參與態度的影響

在本研究中，女性參與者的參與率，從前測到第二次介入階段，以及 ADTP 分數均高於男性，儘管都未達統計顯著，但是這暗示女性在這類課程中的積極參與和對身心障礙議題的關注可能更高。

（四）家庭與朋友背景的影響

論家庭成員是否為身心障礙者，或是參與者是否有身心障礙的朋友，在前測與後測的 ADTP 分數皆未呈現顯著差異。這或許表明，目前使用的評估工具在衡量參與者對身心障礙者的態度時，未能充分捕捉這些特定背景因素對態度的影響。因此，在未來的研究中，或許需要考慮對現有評估工具進行調整，以更好地反映參與者在不同社會背景下對身心障礙者的態度變化。

（五）研究倫理的遵循與保障

本研究在設計與實施過程中，嚴格遵循臺灣大學研究倫理中心的審查規範，並獲得倫理審查通過。所有參與者均基於自願原則參與，且在研究開始前已獲得書面知情同意，確保他們對研究目的、流程及個人權益有充分了解。參與者的身份與回應內容均被嚴格保密，使用匿名方式進行數據收集與分析，並採取多重措施以保障參與者的隱私與尊嚴。本研究的參與者包含障礙者與非障礙者，研究過程充分考量了參與者的特殊需求，並提供必要的協助，確保其能夠平等參與研究活動。

伍、研究討論與限制

在現代教育體系中，隨著社會多元化的加劇，對於身心障礙者的包容和平等接納已成為教育領域的重要課題。傳統的教學方法，如生命教育，雖然對於提高學生對障礙者的認識和理解有一定的作用，但面臨著深度和廣度上的局限性。在這種背景下，探索和實施創新的教學策略，如專業協作課程，顯得尤為迫切。本研究以融合 CRPD 與 SDGs 概念所規劃之音樂培訓創新課程出發，藉由實行生命教育與專業協作課程之比較，旨在揭示這些策略對於促進學生對障礙者的正面態度改變的有效性。根據上述資料分析，研究討論可以分為三個部分說明。

一、專業協作課程設計對障礙態度改變的影響

在當前教育體系中，生命教育課程是推動校園多元與共融性的重要媒介，承擔了啟蒙學生對障礙者的理解與接納的重任。然而，傳統的生命教育在深度和廣度上有所限制，未能充分促進學生對障礙者權利的全面認識。在這樣的背景下，發展融合 SDGs 與 CRPD 目標的課程設計是當務之急。

本研究所實行的課程，以專業協作課程的設計吸納了聯合國《身心障礙權利公約》（CRPD）與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所強調的平權意識，不以幫助出發，而是提供障礙者與非障礙者平等參與展演規劃工作之機會。與傳統的單向宣導式平權教育不同，這種課程設計將平權概念與日常生活、尤其是職場中的專業協作緊密結合。通過這種方式，學生不僅在理論上了解障礙者的權益，更在實踐中學會如何在多元的工作環境中與不同背景的人共事與相互理解。這種課程設計顯著地提高學生對障礙者的接納與尊重。

從實證研究的角度來看，專業協作課程設計在學生平權意識與障礙態度上的提升作用尤為明顯。數

據分析顯示，參與專業協作活動的學生，在對障礙者的態度評估（ADTP）分數上有顯著提高，這一結果高於生命教育課程的成效。這說明，與傳統單向宣導不同，透過實際的職場模擬與專業互動，學生在減緩對於障礙者的態度與偏見上，成果顯著。

此外，本研究進一步顯示，實務導向的專業協作課程設計在減少偏見與促進共融方面的有效性與國際研究趨勢相一致。例如，Tervo 等人（2002）的研究指出，醫學領域中參與與障礙者的直接互動活動顯著改善了學生對障礙者的態度，與本研究的共融協作活動結論相互支持。此外，Yuker 與 Block（1986）在其對 ADTP 量表的研究中強調，參與者對障礙者態度的提升與教育介入的深度相關。本研究的結果進一步驗證了這一結論，顯示創新教育設計能有效促進學生對障礙者的接受與尊重。

二、性別與身心障礙者的關聯性對態度的影響

在對障礙態度的研究中，儘管性別和與身心障礙者的關係並未顯現統計學上顯著的趨勢，卻展現了一些有趣的現象。首先，女性參與者在態度測量分數上、參與比例與人數上皆高於男性，即使 ADPT 分數差異未達顯著，但女性對於此類議題的關注似乎較高。這或許與女性在社會中通常扮演照顧者的角色有關，這使她們對身心障礙者的需求和處境更具敏感度和同理心。不過，這個推測需要更多的證據來加以驗證，以確定女性在此議題上的特殊反應是否確實與其社會角色有關。

另一方面，是否有身心障礙家庭成員的參與者，以及是否有身心障礙朋友的參與者分數，在前測與第一次介入的 ADPT 分數比較中，互有高低，但統計上也都不顯著。這與原始推測，即擁有直接與身心障礙者生活經驗的參與者，分數應該有別於沒有此類經驗的參與者之假設不成立。這樣的結果表明，生活經驗對於態度的影響可能比預期更加複雜，或許是由於現行調查工具未能充分捕捉這些經驗的質性差異。因此，後續將討論是否需要對調查工具進行調整，或者應納入更多背景變項，諸如參與者與身心障礙者的互動頻率、照顧責任的負擔程度、以及社會支持的可用性等因素，從而更全面地反映參與者的態度變化。

綜上所述，雖然這些性別以及與身心障礙者是否有直接生活經驗，對於分數比較上，在統計學上並不顯著，但它們揭示深層的社會文化動力和潛在的影響因素。未來的研究需深入探討這些差異背後的原因，並考量如何透過教育和社會支持，改善對身心障礙者的態度，進而促進一個更為包容和平等的社會。

三、執行創新課程的挑戰與困境

創新課程的實施雖然富有前景，卻同時面臨著一系列挑戰與困境。這些挑戰不僅影響了課程的實際運作，更關乎於學校和參與者的資源與動力。首先，面對少子化的趨勢，學校資源緊張成為不可忽視的問題。少子化導致學生人數減少，學校的經費和人力資源隨之壓縮。在這種背景下，學校能否提供足夠的支持來實施創新課程，成為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創新課程往往需要更多的物質和人力投入，如專業協作活動、場域參訪等，這些都需要學校在財政和組織上的大力支持。但在資源有限的情况下，如何平衡創新與實用性，是學校必須面對的挑戰。

其次，與傳統課程相比，創新課程如場域參訪、實地體驗等，需要更多的前期準備和策劃。這不僅對教師是一種挑戰，同時也增加了學生的參與負擔。教師需要投入更多時間和精力來設計課程、聯絡場地、準備教材等。學生方面，他們需要適應非傳統的學習方式，並投入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參與活動。這種增加的負擔可能會影響學生和教師的參與動機，尤其是在學業壓力已經很大的情況下。

最後，這些挑戰和困境並不是不能克服的。透過創新的課程設計，學校可以為學生提供更豐富、更有深度的學習體驗。學生能夠在真實的環境中學習，更好地理解理論與實踐的結合。對於教師而言，參與創新課程的設計和實施，不僅是專業上的挑戰，也是個人成長的機會。透過這樣的課程，學生和教師可以一起探索新的知識領域，共同成長。因此，儘管存在挑戰和困境，創新課程的實施仍然具有重要的價值和意義。

四、研究限制

本研究的參與者來自研究者所授課的班級。在研究過程中，考慮到教師與學生之間的權力關係以及研究倫理的問題，研究團隊並未採用隨機選擇的方式來選取第二階段介入的參與者。這是為了避免學生感到參與研究有任何被迫的壓力。因此，參與專業協作活動的學生是基於自願原則進行的，這一點對於招募過程產生了明顯的影響。由於研究團隊無法控制願意參與專業協作活動的學生數量，這可能導致了樣本的不均衡。

此外，自願參與的性質也可能導致了所謂的選擇偏差。這意味著那些選擇參與專業協作活動的學生，可能本身就對人權觀念持有更開放和友好的態度，以及對障礙者有較高的接受度。因此，這些參與者的態度可能與那些未參與專業協作活動的學生有所不同。這種現象在研究中不可避免，但它對於研究結果的解釋和推廣可能造成一定的限制。

此外，本研究的樣本規模，特別是在第二次介入活動中的參與者數量，對研究結果的普遍性造成一定限制。由於參與共融協作活動的學生為自願參與者，可能存在選擇偏差，即這些學生本身可能對身心障礙者持有較正面的態度，從而影響結果的解釋。未來研究應考慮擴大樣本規模，並嘗試採用更具隨機性的樣本選擇方式，以減少偏差。同時，對於參與者的背景變項如與障礙者的接觸經驗、性別角色等進行更深入的探討，也將有助於全面理解這些因素對態度的影響。

五、研究結論

本研究在探討高等教育在推動共融與多元社會中的責任與作用，以及多元教育的成就與局限性，並強調培育多元性與包容人才對臺灣邁向國際化的重要性。研究發現顯示，高等教育在塑造學生對於身心障礙者和其他社會少數群體的態度上扮演著關鍵角色。在這個多元化日益增長的時代，大學及其相關教育機構不僅是知識傳承的場所，更是培育學生對於多元文化和社會共融認知的重要基地。

傳統的多元教育策略，如生命教育和文化多樣性課程，在提升學生對社會多元性的認知和理解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然而，這些方法在深度和廣度上存在局限，無法完全滿足當前社會對多元共融意識的需求。因此，本研究強調需要更多創新的課程設計來提升學生的多元意識。這包括實踐導向的教學方法、跨文化交流活動、以及與社會多元實踐相結合的課程內容，從而使學生能夠更加深入地理解和尊重社會的多樣性，讓臺灣不僅能夠在國際舞臺上更具競爭力，同時也能夠成為一個更加包容和多元的社會。

參考文獻

- 李翠玲 (2011)。國小語文領域教科書中身心障礙人物之內容分析研究。《教科書研究》，1 (4)，31-54。
- 洪惠芬 (2012)。「分配正義」還是「形式正義」？身心障礙作為福利身分與歧視的雙重意涵。《台灣社會福利學刊》，10 (2)，93-160。
- 許雅惠 (2011)。大專校院資源教室輔導教師工作現況之研究。《屏東教育大學學報》，37，27-56。
- 陳立言 (2011)。台灣推動生命教育的成果及未來發展。《台灣教育》，667，7-14。
- 梁雯媛、孟瑛如 (2019)。身心障礙者在國小國語文教科書中出現率及相關內涵探討。《特教論壇》，27，62-82。
- Ambariyanto & Y. J. Utama (2020). Educating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to support SDGs: Indonesian case. *E3S web of conferences*. <https://doi.org/10.1051/e3sconf/202020202015>
- Brolan, C.E. (2016). A word of caution: Human rights, disability,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st-2015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laws*, 5(2), 22.

- Burgstahler, S. (2004). Disability-related simulations: If, when, and how to use them in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Review of Disability Studies, 1*(2).
- Celik, E. (2017). The role of CRPD in rethinking the subject of human rights.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ights, 21*(7), 933–955.
- Cobley, D.S. (2013). Towards economic participation: Examining the impact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in India. *Disability & Society, 28*(4), 441–455.
- Cohen, S., Knifton, R., Leonard, M., & Roberts, L. (2015). *Sites of popular music heritage, memories, histories, places*. Routledge.
- Connor, R. (2015). *The United Nations world water development report 2015: Water for a sustainable world* (Vol.1). UNESCO publishing.
- Danaher Jr, W.J. (2010). Music that will bring back the dead? Resurrection, reconciliation, and restorative justice in post-apartheid South Africa. *Journal of religious ethics, 38*(1), 115–141.
- DeNora, T. (2004).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in music sociology. *Poetics, 32*(3–4), 211–221.
- Elliott, D.J. (2012). Another perspective: Music education as/for artistic citizenship. *Music Educators Journal, 99*(1), 21–27.
- Garnett, T. (2016). *The day the music died: a life lived behind the lens*. Hachette.
- Hargreaves, D.J., & North, A.C. (1999). The functions of music in everyday life: Redefining the social in music psychology. *Psychology of Music, 27*(1), 71–83.
- Harpur, P. (2012). Embracing the new disability rights paradigm: The importance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Disability & Society, 27*(1), 1–14.
- Higgins, L., & Bartleet, B.-L. (2012). The community music facilitator and school music education. In G. McPherson & G.F. Welch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music education* (Vol. 1, pp. 495–511).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olmwood, J. (2016). ‘The turn of the screw’; marketization and higher education in England. *Prometheus, 34*(1), 63–72.
- Jones, B.D., & Vedlitz, A. (1988). Higher education policies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American states. *Economic Development Quarterly, 2*(1), 78–87.
- Jones, T.E., Mack, L., & Gómez, O.A. (2024). Students’ perspective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in a Japanese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ustainability in Higher Education, 25*(1), 182–201.
- Kerr, S.T. (1988). The Soviet reform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Review of Higher Education, 11*(3), 215–246.
- Langan, R.J., Onel, N., & Weidner, K. (2024). Addressing the U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An examination of sustainability offerings in marketing curriculum and a framework for advancement. *Journal of Marketing Education, 46*(2), 175–188.
- LeVine, M. (2012). Music and the aura of revolu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44*(4), 794–797.
- Maisel, J., & Steinfeld, E. (2022). Universal design and the built environment. In *Rehabilitation Engineering* (pp. 295–318). CRC Press.

- Opoku, A., & Guthrie, P. (2017).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built 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struction Education and Research*, 14(1), 1–3. <https://doi.org/10.1080/15578771.018.1418614>
- Perales Franco, C., & McCowan, T. (2021). Rewiring higher education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The case of the intercultural university of Veracruz, Mexico. *Higher Education*, 81, 69–88.
- Schäfer, T., Smukalla, M., & Oelker, S.A. (2014). How music changes our lives: A qualitative study of the long-term effects of intense musical experiences. *Psychology of Music*, 42(4), 525–544.
- Schur, L., Kruse, D., & Blanck, P. (2013).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Sidelined or mainstream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ilverman, A.M. (2015). The perils of playing blind: Problems with blindness simulation and a better way to teach about blindness. *Journal of Blindness Innovation and Research*, 5(2). <http://dx.doi.org/10.5241/5-81>
- Sonetti, G., Barioglio, C., & Campobenedetto, D. (2020). Education for sustainability in practice: A review of current strategies within Italian universities. *Sustainability*, 12(13), 5246.
- Tervo, R.C., & Palmer, G. (2004). Health professional student attitudes towards people with disability. *Clinical Rehabilitation*, 18(8), 908–915.
- Wright, R. (2015). Music education and social reproduction: Breaking cycles of injustice. In Cathy, B. (Ed), and other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social justice in music education* (pp.340–356). Oxford Academic.
- Yuker, H.E., & Block, J.R. (1986). *Research with the Attitude Toward Disabled Persons scales (ATDP) 1960-1985*. Hofstra University.
- Yuker, H.E., Block, J.R., & Young, J.H. (1966). The measurement of attitudes toward disabled persons. *Human Resources Study*, 7, x, 170.
- Zhang, S., Zhou, Y., Yu, R., Xu, X., Xu, M., Li, G., Wang, W., & Yang, Y. (2022). China's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338, 130595.